

金圣叹对《水浒》的“症候阅读”

孙宗胜, 吴子林

(华北科技学院文法系, 北京, 10160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金圣叹对于《水浒》的删削, 包括对宋江的“改写”和对小说的“腰斩”; 这些删改是金氏“读者精神”的积极参与, 实为金圣叹的“症候阅读”。“症候阅读”激发出了文学文本内部的能量, 强化了小说评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关键词: 金圣叹; 删削《水浒》; 读者精神; 症候阅读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5-0598-06

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金圣叹评点《水浒》时, 一方面有意无意地维护着官方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又生产出他异的因素, 反思、质疑乃至颠覆着官方意识形态^[1]。金氏一贯推崇文法之“精严”, 那么, 怎样理解其思想的内部矛盾, 他自己又是如何求得其思想的一致性呢?

早在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 恩格斯就指出, 艺术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 与政治、经济理论相比, 它具有更高的“不透明度”。到了20世纪, 阿尔都塞更是反对用本质论的观点去研究意识形态, 他的兴趣是研究某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伦理、法、政治等)的物质性实践, 以及主体是通过哪些程序被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中的。他发现, 人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 早已由一系列对世界的代表系统所决定了的“屈从体”, “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的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性质。人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 是如何将自我投向社会的呢? 阿尔都塞认为, “意识形态是物质性的存在”, 而不是“纯粹”的思想, 它永远存在于宗教、伦理、政治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它们的实践之中。在他看来, “没有具体的主体也就没有意识形态可言”, 意识形态通过诱使个人与它认同而从个人中“招募”主体, 把个人变成主体。因此, “我”这个主体的形成是“屈从”的结果, 而且, “我”所屈从的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我”的力量, 这种力量中有“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才能成为“主体”。阿尔都

塞的结论是, 意识形态中的被压迫者永远是参与压迫者对他的压迫的。这与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 艺术既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沉浸在它之中, 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 从而指向它; 艺术不是像科学那样对意识形态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知识, 而是让我们“看见”“察觉”和“感受到”意识形态而已。“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人的存在本身的生活经验”^[2]。因此, 一个人所处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等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体系, 除了政治信仰之外, 文化、伦理、教育、法、家庭等等意识形态同样深刻地制约着一个主体的存在。这样, 作品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与其说因为它说了什么, 还不如说是因为它没有说什么; 在文本意味深长的“沉默”中, 在它的空隙和省略中, 我们最能够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存在。这里的“空隙”和“省略”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 而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局限性的结果, 即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而不能说或想不到说。所以,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对文本所说的部分加以释义, 而是使那些“沉默”的部分说话, 并因此而获得关于意识形态的知识; 批评家必须从文字表面不完全的和充满省略的文本表层结构深入下去, 通过对“症候”——空白、图式、沉默——的细读, 找出隐藏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下面的无意识结构和理论框架。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谓的“症候阅读”。

阿尔都塞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很有借鉴意义。以往, 我们往往以为文学作品总

是一个“有机体”,可是阿尔都塞告诉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我”这个主体的形成是“屈从”甚至是参与其间的结果,因此,文学文本根本就不可能构筑出一个连贯一致、完美无缺的有机整体,而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呈现为各种意义之间的矛盾与脱节。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小说的文本,尤其在明末之前,往往经历了专业说唱、不同时期的创作、订正、扩充、修改,甚至把几种毫无联系的传统原本拼合在一起的发展过程。在这“拼合”的过程中,就渗透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小说文本不可避免地充满裂缝、自相矛盾和悖论,而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结构,留下许多可以自由读解或续写的意义“空白”。更重要的是,经过不同文人不断地改写,作者主体意识平均化了,在限定“释义”的诸多语境条件下,“意图语境”的重要性降低,而“情境语境”的重要性增加,作者的意图更多地让位给特定时代读者的意图,为“读者精神”的介入提供了契机。阿尔都塞所谓的“症候阅读”,表面上意味着将潜在的东西揭示出来,实际上是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改造,是读者之意与作者之意互渗而创生出的一种新的意义。因此,“症候阅读”的实质是“读者精神”对于文本的积极参与和创造。阿尔都塞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金圣叹删削《水浒》的批评实践。

在《水浒传》“楔子”回评里,金圣叹指出,“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他反对“只记得若干事迹”的非审美阅读方式,主张由“理会文字”入手,看出“无数方法,无数筋节”,而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其《读第五才子书法》指出,为得作者之心,则须“虚心平气,仰观俯察,待之以敬,行之以忠”^[3],即发挥移情式想像,设身处地地与小说中的人物一道体验所发生的事件。可见,“读者精神”的核心,是渗透着读者情感与想象的语言体验。金圣叹认为,只有发挥出“读者精神”,才能成为作者的知音,使得文本的诠释与作者意图相契合;然而,作者意图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第二十一回回评云:

呜呼!言何容易乎?我谓声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难,请举易者,而易莫易于文笔。乃文笔中,有古人之辞章,其言雅驯,未便通晓,是事犹难,请更举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梨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者乎?

因为,词语和意义之间往往存在着差异,如果褒

贬在“笔墨之外”,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之间未能一一对应,读者又该如何读解呢?第二十五回回评云:

……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查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

英国现代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4],不同的读法是在进入不同的存在方式。一般人只懂得一种欣赏角度与方法,金圣叹则不然,他通过“徐读”“疾读”“歇续”“楚声”“豺声”种种读法,打开了文本的不同世界。

金圣叹删削《水浒》主要围绕“独恶宋江”与“招安”问题展开,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改写”宋江,还是“腰斩”古本《水浒》,都充分展现了“读者精神”,它们实为一种“症候阅读”。

“改写”宋江——金氏的“症候阅读”之一

宋江是《水浒》中最重要的的人物,他有不少诨号,如“呼保义”“及时雨”和“孝义黑三郎”等。“呼保义”之“保义”是宋代武官名“保义郎”之简称,“呼”乃称呼之义,“呼”作“保义”即呼作“保义郎”,而“保义”作为宋人喜欢的称呼,又与此官衔常用以笼络义军首领及作为疏财出力者的虚衔有关^[5]。更重要的则在于“保”的是“义”,主要是江湖“义气”。在宋江“成名”的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仗义疏财”,且主要以“江湖好汉”为对象,“及时雨”可谓“呼保义”之通俗的解释。宋江“于家大孝”,又称“孝义黑三郎”。这些诨号表明,在宋江身上汇聚了君子的一切优点——孝顺、仁义、慷慨、正直——而近乎完美无瑕,备受众人爱戴。因此,明人褒赞《水浒》必首赞宋江,其中李贽的赞词最有代表性:“……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耳。”^[6]这一观点有广泛的影响,人们多从其说,独金圣叹以为不然。在他看来,小说写一百七人用的是“直笔”,写宋江则用“深文曲笔”,宋江实为不忠、不

义、不孝之徒。

先说宋江之“忠”。金圣叹特别反对将“忠”归于宋江,第十七回回评云:“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入本传之始,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宋江“坏国家之法”,犯了“通天之罪”,无“忠”可言。再看宋江的“义”。宋江讲义气可谓声名远扬,小说反复写到他提及他的名字,他每每获救,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对于宋江的疏财,金圣叹有自己的看法,第三十六回回评云:“其结识天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矣”;“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宋江甚至还有“弑兄”的罪名。如,在梁山泊连续四次的军事行动中,宋江成功地阻止了晁盖指挥战斗,使得晁盖在山寨的地位名存实亡。可见,宋江不过是“权诈”之徒耳。再论宋江之“孝”。小说告诉读者宋江对父亲如何念念不忘,如何言听计从云云。如第三十五回宋江对父亲说,自己并不愿与江湖朋友见面,惟恐有碍于“孝道”。实际上,他却言行不一。第三十五回夹批云:“于清风山收罗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及燕顺等三人纷纷入水泊者,复是何人?方得死父赚转,便将生父热瞞,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乃至忍于欺其至亲。”总之,宋江是一个不忠、不义、不孝的“权诈”之徒。金圣叹的读解是真正“圣叹文字”,他的这番读解是建立在一定文本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作为其依据的“文本”不是所谓的“俗本”,而是经过他自己删削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如,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六十回云:“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此辈,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征。”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弟弟去。”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便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首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未为晚矣。”金批《水浒传》第五十九回则改为:“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

不捉得此辈,誓不回山!我只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首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饮酒之间,忽起一阵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不难看出,金圣叹或是“订正”了几个字,或是置换了人物,或是大量地删除文字,便与容与堂本《水浒传》区分了开来。正是通过对《水浒传》“俗本”类似的截读、节读、整顿回目、辨正事实,乃至文字的润色和订正,再配之以金氏“言之凿凿”的批语,以及宋江诸多罪状的列举,便将容与堂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从忠孝两全、重义轻财的好汉英雄,“修整”成了一个权诈、虚伪的强盗和阴谋家。金圣叹为什么要如此“改写”宋江呢?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单是其中的宋江形象便至少包含了三种来源不同的成分:一是来自《大宋宣和遗事》等史实的“山大王”身份;二是来自《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的义侠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中的“忠孝”思想^[7]。这些异质的存在,使宋江这个人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的“裂痕”。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二》指出:“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因此,“水浒”实际上是一个边缘的世界,是一个游离于社会秩序并与社会对立的社会群落。“江湖”之“义”与“朝廷”之“忠”,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之间的鸿沟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填平。如当宋江获悉“智取生辰纲”事发,赶紧偷跑去通知晁盖,这是徇私枉法,是“义”而非“忠”的举动。后来,宋江也反上了梁山,并向晁盖等发誓:“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但是,宋江的思想性格并没有沿着这一进程自然发展,而是发生了巨大转折:第四十一回宋江回家取父,见了九天玄女,接了一道“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从此,宋江便以“忠”统帅“义”,把对晁盖发的重誓抛之脑后,成了执行“法旨”的“星主”。于是,其思想人格发生了严重分裂:一面领导武装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面又只图招安,反复念起了“投降经”。晁盖一死,他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试图将“义”纳入“忠”的轨道,宣称:“愿

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前后两个宋江明显存在“拼合”痕迹。

对于玄女授天书的灵异情节,台湾学者以为,这“只是沿袭了《宣和遗事》留下来的模子,套用了这一个传统习见的常典而已”^[8];而大陆学者认为:“(作品)只是以九天玄女的‘法旨’使其(宋江)产生这种根本性变化,这就不是在典型环境中刻画人物,而是从观念出发去描写,违背了现实主义原则,失去了真实性基础,造成了宋江形象的分裂。”^[9]这些看法滞留于表面,都不够深入妥切。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指出:“《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当宋江与高廉交兵,欲借助“天书”破敌,结果反遭败绩时,金圣叹便由“天书”功能的丧失,游离本文这一叙述的“漏洞”,“觑破”了奸雄的“欺世”手法。第四十二回回评云:“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宋江梦玄女授天书与陈胜的“大楚兴,陈胜王”的伎俩如出一辙。在论及文人多用黄石公、玄女、白猿一类典故时,钱锺书先生指出:“此等熟典,已成公器,同用互犯者愈多,益见其为无心契合而非厚颜蹈袭。”^[10]这里,“无心契合”四字最值得推敲,它暗示着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借用传统习见的神话典故,赋予英雄人物以神格,往往反映了世间大事皆由“天命”的一种传统观念。如玄女的“法旨”,给梁山大业定下了纲领性口号:“替天行道,辅国安民。”在封建社会里,“天”是神圣化的朝廷的表征,“辅国”则是辅助皇帝和朝廷治理天下。小说作者袭用玄女、天书的“熟典”,其本意显是欲将宋江塑造成“忠义不负朝廷”的“星主”,而“合理化”地统合存在诸多异见的文本。与之配合,后五十回则续写宋江等受朝廷招安,建功立业,大显其忠烈。殊料这种意识形态“元语言”的渗透与控制,反而加剧了宋江本人思想人格的严重分裂。金圣叹自幼对《水浒传》烂熟于心,自然读出了“俗本”这些“捏撮”之处,而揭示出了前人未见的盲点。

金圣叹素以文法“精严”为美的极致,为此,他“自我作古”地对“俗本”《忠义水浒传》作了删削。这些“改写”实际强化与凸显了文本的“裂缝”,使得文本内部自相矛盾、自我颠覆,而彰显了宋江之罪不可恕,突出了自己“独恶宋江”的思想倾向。《读第五才子书法》云:小说“擒贼先擒王”,“句句深著宋江之罪”,“盖此书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只是把宋江深

恶痛绝”,“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显然,“改写”宋江是金圣叹美学思想与意识形态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式,其实质是一种释放文学内部能量的“症候阅读”。

“腰斩”古本——金氏的 “症候阅读”之二

金圣叹“腰斩”《水浒》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学术问题,其分歧最多、争论也最为激烈。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腰斩”问题已成定论,后来虽有学者提出异议,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被学术界接受。80年代罗尔纲先生认为罗贯中原本为七十回,后经人伪续才成为百回本。此说遭很多人质疑,未能得到学界认可^[11]。90年代,这个问题又出现争论。如周岭认为,“腰斩问题成为‘定说’的根据,全属悬拟之词”,该文对于传统观点的三个证据一一提出质疑,其结论是:1)金圣叹没有腰斩过《水浒传》,他所评点的七十回本《水浒》确有所本;2)金批七十回本《水浒》的底本并不是所谓“古本”,而是嘉靖时人腰斩郭勋百回繁本改写而成的本子^[12]。此文很快引起了商榷,王齐洲从“腰斩”说是如何定论的、周文所列“证据”之检讨、“腰斩”说论据释疑三个部分进行辨析,指出周文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存在问题,而且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也较低,不能推翻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定论^[13]。的确,迄今为止,谁都没有直证材料可以证明金批本《水浒传》是“古本”。对于金圣叹“腰斩”《水浒》,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基本态度:其一,对其动机和效果都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立论多从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而来,认为金圣叹腰斩小说的动机是仇视农民起义,反对招安政策,梦想将起义英雄斩尽杀绝,其效果是使小说成了“断尾巴蜻蜓”,破坏了小说情节结构的完整性^[14];其二,对其动机和效果都持肯定态度,认为金圣叹此举“把鼓吹投降主义的《忠义水浒传》改造成为宣传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的“革命课本”^[15];其三,动机上予以否定,效果上则予以肯定,即认为金圣叹“是从封建立场删的,但同时也把从反封建立场看来更该删的删了。虽说删掉之后,还假造了卢俊义一梦,影射宋江等不会有好结果,但比受招安之类,还是好得多。这是金圣叹所万万想不到的”^[16]。这些意见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它们都囿于价值判断而各取所需。其实,金圣叹删削《水浒》与小说集体创作、世代累积的特点不相违悖,

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此举的动机和效果。要准确理解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它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

金圣叹《水浒传·序三》自称:“吾既喜读《水浒传》,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抄,谬自评释。”到崇祯十四年金批《水浒传》付梓,前后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正值明王朝礼崩乐坏、内外交困的时期,不堪剥挠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巨野人徐鸿儒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成了农民起义的前奏;崇祯元年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在陕北发动起义,陕西饥民也纷纷参加起义;次年,明廷裁驿站,数十万驿马夫加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李自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崇祯三年六月,王嘉胤兵克府谷,张献之聚众响应。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明朝廷中主抚派一败涂地,导致农民起义军此伏彼起。如崇祯四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侍郎杨鹤招安农民军于宁州,农民军降后不久便反正。崇祯七年夏,总督侍郎陈奇瑜率官军围高迎祥、李自成诸部于兴安之车箱峡,农民军伪降,陈奇瑜受之;农民军出峡后,即重举义旗,洛阳农民军数万来会,农民军气势炽盛一时。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之在谷城降明,兵部尚书熊文灿受之,次年五月,张献之于谷城重举义旗……这些便是构成金圣叹评点小说之“情境意图”的时代背景。作为封建社会中正直而又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金圣叹所幻想的是一个既没有昏君、贪官污吏,又没有“流贼”的升平社会。第三十四回回评云:“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本回夹批又云:“以上一篇单表水泊雄丽精严,是全部书作身分处。”原来,水泊梁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的蓝本,他仍然没有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视域。在金圣叹所列的“才子书”中,屈原的离骚之作、杜甫的稷契之思,正是这种理想追求的反映。

金圣叹《水浒传·序二》云:“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这里的“当世之忧”,即其在评点中流露的“天下太平”的情结。金圣叹对“俗本”《忠义水浒传》极其不满,主要是反对其中的招安政策,认为它“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第五十七回回评云:“夫招安,强盗之变计也”;《水浒传·宋史目》又云,“招安”既“失朝廷之尊”,又“坏国家之法”,“从此无治天下

之术”。为此,金圣叹以不“殊累盛德”为原则,“腰斩”了心目中的“恶札”,再加上“惊恶梦”,便始自“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终于“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这宛如一把双刃“剑”,既痛快淋漓地宣泄了自己对于昏君、贪官的愤恨,又彻底“收拾”了“流贼”。小说“楔子”开篇有诗云:“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金圣叹批道:“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小说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云:“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金圣叹回评云:“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我们知道,“楔子”和“惊恶梦”实际都是金圣叹自己所编撰,他不厌其烦地自撰自批,凸显了自己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心愿与努力。金圣叹说此举乃“削忠义而仍《水浒》”,即作者意图的还原。在他看来,读者读了此“古本”之后,便能在内心深处遏止住集体政治行动的破坏倾向,收到既“诛前人既死之心者”,又“防后人未然之心”的效果。显然,金圣叹“腰斩”《水浒》与“改写”宋江都是其“读者精神”积极参与的产物,都是激发文本内在活力的“症候阅读”。

金圣叹对于小说作品情味的体会,究其本实源于八股文的“代古人语气为之”。有明一代,是八股文盛行的时代,它的内容虽系乎经义,形式却是文学的,非常注重艺术表现,故古人称之“制艺”。根据八股文的要求,揣摩“经义”的关键,在于体会古人语气,进入角色,自己作圣人,摹其声口。明华盖殿大学士张位,曾讲作八股文之法云:“作文是替圣贤说话,必知圣贤之心,然后能发圣贤之言。有一毫不与圣人语意相肖者,非文也。”^[17]金圣叹曾经研习过八股文,自然掌握了这一副手眼。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性情之作,即所谓的“发愤作书”,读者阅读自然更当体会作者当时的处境与心情、感受和体验,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但是,所谓作者“原意”的寻求,实际只是一种幻想和信念,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存在,以一个完全剔除历史偏见的清明之体存在。任何一种理解,都源自每个人、每代人生活经验形成的独特视野,而由每个人自我理解的欲求所驱使,而必然以读者“情境语境”置换作者“意图语境”。

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指出,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格式塔”的建构过程:“这样的‘格式塔’不可避免地染上读者本人的,特殊的选择

过程之色彩。这是因为‘格式塔’不是由文本形成的,而是诞生于文本和读者心灵的相互作用;而读者的心理又受其自身的经历、意识、世界观的制约。这一‘格式塔’不是文本的真正意义,至多只是建构的意义”^[18]。任何阐释都是读者与文本的聚合,金圣叹删削“水浒”并非作者意图的简单还原,也不仅仅是纯粹的美学手段,而是一种“格式塔”的建构;这种“自我作古”式的“症候阅读”,较好地解决了金圣叹思想的矛盾冲突,强化了小说评点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 吴子林. 小说评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J]. 浙江学刊, 2003 (1): 108-116.
- [2] 徐贲.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02-107.
- [3] 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才子书: 第1卷[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14.
- [4]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3.
- [5] 何心. 水浒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31-135.
- [6] 陈曦钟. 水浒传会评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28-29.
- [7] 陈洪. 金圣叹传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72.
- [8] 胡万川. 玄女、白猿、天书[A].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台湾香港论著选辑[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45.
- [9] 欧阳代发. 论《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塑造[J]. 水浒争鸣(第六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88.
- [10] 钱锺书. 管锥编: 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30.
- [11] 罗尔纲.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111-141.
- [12] 周岭.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J]. 文学评论, 1998 (1): 72-81.
- [13] 王齐洲.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与周岭同志商榷[J]. 江汉论坛, 1998, (8): 104-108.
- [14] 鲁迅. 谈金圣叹[M]. 鲁迅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121.
- [15] 张国光. 金圣叹的志与才[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8. 52.
- [16] 聂绀弩. 水浒五论[M].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12.
- [17] 武之望. 举业厄言: 卷2[M]. 明万历己亥刊本.
- [18] 伊瑟尔. 隐喻的读者: 小说中的交流模式[J]. 文艺理论研究, 1997(3): 11.

On Jin Shengtan's symptomatic reading of Shuihu

SUN Zongsheng, WU Zilin

(School of Arts and Law,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101601, Chin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Jin Shengtan's revision of Shuihu, including his rewriting of its main character named Song Jiang and abridgment of Shuihu, is the spirit of the reader's participation. It is Jin Shengtan's "Symptomatic Reading" which evokes the inner energy of literature and strengthens func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Key words: Jin Shengtan; revision of Shuihu; the spirit of the reader; symptomatic reading

[编辑: 苏慧]